



BOWUYUAN

博物苑

南通博物苑苑刊 总第十五期



2009 · 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博物苑. 总第 15 期/王栋云主编; 陈卫平, 金艳, 徐宁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5010-2960-0

I. 博… II. ①王…②陈…③金…④徐… III. ①博物馆事
业—南通市—丛刊 IV. ①G269.275.3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3179 号

书 名	博物苑 (总第 15 期)
主 编	王栋云
执行主编	陈卫平
副 主 编	金 艳 徐 宁
责任编辑	刘 婕
美术编辑	张炽康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编 100007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89 × 1194 1/16
印 张	6
字 数	143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0-2960-0
定 价	20.00 元

投稿邮箱 bjb@ntmuseum.com

博物苑

BOWUYUAN

南通博物苑苑刊

总第 15 期

2009 年第 2 期

2010 年 3 月 28 日

主 编：王栋云

执行主编：陈卫平

副 主 编：金 艳

徐 宁

美术编辑：张炽康

专 文

- | | | |
|---|------------------------|-----|
| 1 | 吴邦国委员长到南通博物苑视察记 | 海江文 |
| 3 | 略论海派艺术的历史传承与曹聚平先生的特殊贡献 | 沈启鹏 |

文博论坛

- | | | |
|----|-------------------------|-----|
| 5 | 独树一帜：南通文博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回顾与思考 | 王倚海 |
| 11 | 论遗产的双重属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保护 | 赵明远 |
| 16 | 用创新思维推动基层文博工作 | 康爱华 |
| 18 | 浅析免费开放博物馆的转变 | 张 莹 |
| 21 | 博物馆的科普教育的作用 | 居卫东 |

工作平台

- | | | |
|----|---|---------|
| 26 | 浅谈博物馆实施技防工程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以南通博物苑为例 | 陈银龙 |
| 28 | 几种要素在展览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以南京孙中山纪念馆《世纪伟人孙中山》陈列展览为例 | 程薇薇 刘碧玉 |
| 34 | 博物馆信息之我见 | 张永春 |

藏品鉴赏

- 38 淮海实业银行纸币价值探析 葛 莉
43 初识明清外销瓷 颜飞成 周 洁

收藏天地

- 51 一份见证中苏友谊的史料 胡小甜

文史考辨

- 54 中国冥府考略（四）——太山章（下） 栾保群
63 略谈中国的古琴与琴派 杨海涛

崇川旧影

- 67 千年南通的第一个崇文盛世和顾养谦 卢君佳 曹晓东

南通史话

- 74 南通早先的机械制造厂 严金凤

绿色长廊

- 77 中日城市园林绿化养护浅见 曹玉星

化石天地

- 81 关于琥珀文化与科学的解读 曹克清
89 古青墩人如何利用麋鹿资源 张美英

域外行知

- 92 尼泊尔游记 黄振平

吴邦国委员长到南通博物苑视察记

海江文

2010年1月15日上午8:40,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省、市领导梁保华、罗志军、罗一民和丁大卫等陪同下,到南通博物苑视察、参观。

一下车,吴委员长就和在此迎候的市文化局长黄振平、南通博物苑苑长王栋云、讲解员周燕等一一握手。刚迈上台阶,委员长就询问博物苑是什么时候建造的。梁书记回答说,新馆是2005年建成的,其前身是1905年张謇创建的博物苑。委员长接着问:“老建筑还在吗?”“还在,一会儿我们去看。”罗一民书记接口答道。

来到《江海文明之光》展陈大厅,委员长对南通的文明发展史很感兴趣,当看到橱窗里陶柄斧头的照片,就想了解是从哪里发掘出来的。罗书记亲自讲解道:这是海安青墩遗址发现的,距今天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与江南良渚文化属同一文化时期。在国家二级文物铜质天妃像前,委员长详细地询问了藏品的历史。

当讲解员周燕向委员长介绍20世纪30年代日本丰田公司生产的纺织设备时,委员长则转过身来向北京来的随行人员说,南通是中国纺织工业的发祥地,近代纺织工业就是从南通起步的。随后罗书记指着英国曼彻斯特生产的纺织机器的标牌说,我们还有更早的,当时张謇从英国引进了先进的纺织机械。

在南通城的沙盘前,委员长认真地听,不时地问,轻松地与陪同人员交流。进入第二展厅,看到“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以及电影艺术家赵丹的画作,委员长赞叹南通出了很多杰出的人才。讲解员讲到张謇引进国内外人才创办了南通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时,他仔细地观看每一件文物,赞不绝口。随后,周燕详细地向委员长介绍了南通进

步学生江上青、顾民元的情况以及江泽民同志为顾民元纪念活动的题词。看到南通的仿真绣、蓝印花布、风筝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黄振平向委员长等领导补充说,仿真绣作品最近作为国礼赠送了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委员长笑得很开心。一旁的罗省长听了情况介绍后,询问它的艺术特征和市场价格,表示仿真绣在今后可作为省政府的礼品。

冬日的阳光让人特别感到温暖,委员长走在博物苑历史文化保护区的石板路上,听着市委、市政府重视文化建设、特别是文物保护工作和文博事业发展情况的汇报,频频点头称许。当看到保存完好的博物苑早期南馆、中馆时,委员长十分赞许当年办博物苑时张謇先生的理念和做法。

走到濠南别业张謇铜像前,委员长和一旁梁书记、罗省长、罗书记、丁市长等讨论着张謇的生平,赞誉一个旧知识分子在国破家亡的时候,实现报国理想的勇气和坚毅。

从濠南别业南门上楼,在一楼大厅委员长听着介绍,感赞张謇平实的人生态度。张謇生平事迹展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到这位清末状元不平凡的人生和同样不平凡的辉煌业绩:举办实业、兴垦植棉、倡导教育、兴盛文化。张謇在日本考察写的《癸卯东游日记》吸引了委员长的目光,梁书记幽默地说这相当于我们现在出国写的考察报告。随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黄镇东是土生土长的南通人,他不时以自己 and 祖辈的经历,向委员长作补充介绍。委员长听了家诫石碑的介绍后,在张家留存的钢琴琴键上弹出了美妙的音符。在张謇书房,委员长还留下了自己的签名。

一路上,委员长精神都很饱满,不时与随行的

人员亲切交谈,肯定这几年南通文化建设的成就,特别是对文物保护的重视。

走出北门,排队等候的博物苑工作人员齐声向委员长问好。委员长走上前去与苑领导和工作人员一一握手,亲切的态度和随和的谈吐激起了一阵阵欢笑声和鼓掌声。一位女职工邀请委员长和大家留影,委员长愉快地和大家站在一起,照相机、摄像机把首长和干部职工笑在一起的情景真实地记录下来。

临上车前,委员长微笑着伸出手,握着陪同的局、苑领导的手说:“谢谢。”这一声“谢谢”里,包含了中央对南通文化保护工作的肯定和赞许。

9点15分左右,车启动了,隔着车窗,委员长两次伸出手来,向送行干部职工亲切告别。

2009年5月8日、8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在南通考察期间参观了博物苑,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又前来视察。在短短的不到九个月的时间里,中央政治局三位常委连续到访南通,密集度之高,不仅反映出这个城市日益增长的魅力与活力,而且还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那就是,在20世纪张謇创造南通近代辉煌后的又一个世纪初的10年,南通创造了新的发展黄金期,这个城市应当在中国文明城市的建设中再次起到示范作用。这是2009年底人文学者余秋雨研习了南通诸多资料,又实地踏访南通后,得出的一个新的判断。

而中央领导频频到访南通博物苑,我想起码说明了这样三点内容:一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高度重视地方文化,身体力行推动历史文化与当代文明的有机结合;二是南通的文博工作经验、历史文化挖掘、特色文化建设有机结合,形成了“南通经验”,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希望借此在全国传播“南通经验”;三是南通市委、市政府领导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率领全市人民,包括文化系统干部职工,在继承的基础上创建、创新了文化工作的内容和形式,弘扬传统文化,建设先进文化,其成就得到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创有特色,劳有所获。

作为文化系统的干部职工,我们应当感到骄傲和自豪,这是历代博物苑人和今天的全市文博工作者的荣耀,也是文化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全市人民的荣耀。2009年底,市委、市政府已经研定了完成小康社会目标后向基本现代化进军过程中建设文化强市的目标。这一目标更加高远,更加令人向往。只有不懈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创造新成就、新辉煌,才能不辜负人民的期望,才能不辜负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嘱托,才能无愧于为我们创造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机遇的这个时代。

新年伊始,各项工作正在开局,中央领导视察、检查工作无疑是巨大的动力。任重道远,我们应当倍加珍惜机遇,倍加努力工作!



略论海派艺术的历史传承与 曹用平先生的特殊贡献

沈启鹏

一、海上画派与吴昌硕

大凡同属一个地域或具有相同特质的一群人,常因其思想倾向、生活态度、艺术追求、风格技法的接近或一致,自觉不自觉地走到一起,自然而然形成流派。学术要“百家争鸣”,艺术要“百花齐放”,流派的形成是学术、艺术发展的一个规律,是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

中国绘画史上曾经有过许多的流派,如南宋四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明四家(也称“吴门画派”,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清四僧(石涛、朱耷、石溪、渐江),金陵八家(龚贤、樊圻、吴宏、高岑、邹喆、叶欣、胡慥、谢荪),扬州八怪(金农、李鱓、黄慎、郑燮、李方膺、汪士慎、罗聘、高翔等)。近现代的流派还有海派、岭南画派、长安画派、新金陵画派等等。他们都对中国画坛产生了巨大影响,犹如一条长河流经的一座座景色独特而秀美的山峰。

清代花鸟画在乾隆时代以后日趋衰退。清末民初,在列强瓜分、国家破败的社会背景下,粗疏草率、纤弱僵化、几近病态的绘画已唤不起人们的审美热情。到了近代,在通商口岸上海,海派艺术奇峰突起,一改画坛格局。“海派”的三个代表人物任伯年、吴昌硕、赵之谦也称“清末三大家”。前期的任伯年长于勾勒,既能师古又有创新,中西融合,人物花鸟皆擅,能力极强,可惜在五十六岁时便英年早逝。后期的吴昌硕和赵之谦,皆善诗、工书、能印,以金石篆籀之趣入画,别开蹊径。特别是吴昌硕,诗书画印全才,注重气势“直追秦汉”,讲求“拙、重、大”,即藏巧于拙、浓墨重彩、大气磅礴,

为沉闷的画坛带来一股强劲而充满生机的空气。作为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他笔力苍简、古味盎然的大写意花鸟画已名播海外,在日本也受到推崇,我在日本和泉市久保物美术馆即亲见一批吴昌硕作品。这个画派的画家还有虚谷、蒲华、任熊、任薰等,群星灿烂、争奇竞艳。有人概括海派绘画的特征有“五性”:继承传统、海纳百川是包容性;标新立异、锐意立新是开拓性;华洋杂处、融合中西是国际性;适应市场、满足需求是商业性;精益求精、雅俗共赏是艺术性。

二、吴派艺术与缶庐高弟王个簃

南通的绘画历来与扬州画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到了清末民初,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先生以南通为实验基地,全面开创近代化建设,不仅文化、教育事业大大发展,还网罗了一大批文人学者及书画家,如王国维、陈师曾、李桢、沈寿、单林、王燕、诸宗元、赵子超、费范九等等,并建大达码头,购置大江轮,打通与上海的联系。

自张謇建成“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南通,20世纪前半叶,南通学子纷纷负笈求学。王个簃入海派吴昌硕门下,高冠华入浙派潘天寿门下,尤无曲得黄宾虹、陈半丁真传。革命文艺家徐惊百受徐悲鸿器重,又播下新兴木刻的火种。他们中的多数都学成归来,不断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如赵无极、袁运甫、袁运生、范曾等。由此,南通的艺术事业开启了接受全方位辐射、多元化发展的新局面。

张謇与吴昌硕曾互相仰慕、交友唱和。张謇与王个簃的一席谈话则促使王个簃舍弃了南通20

银元薪水的职务,1925年由李苦李引荐,投吴昌硕门下为入室弟子兼家庭教师。吴昌硕生命的最后5年,王个簃一直追随左右,耳濡目染。陈师曾于1923年早逝之后,王个簃成为吴昌硕的大弟子。因为王个簃从刻印攻书入手,全面继承吴昌硕的艺术精神,使吴派艺术得到了传承,并发扬光大。王个簃除了向西泠印社、上海画院、上海美术馆捐赠他收藏的吴昌硕画作,还将自己的作品和收藏吴昌硕的作品捐给家乡。个簃艺术馆建成20年来,已经成为了南通传承吴派艺术和促进学术交流的平台。

早在20年代,王个簃与刘海粟、张大千的作品即赴英国伦敦、德国柏林展出并获奖和入藏。他在上海美专、新华艺专、中华艺专、昌明艺专任教期间,培养了众多学生,陈大羽、程十发、曹简楼、刘伯年、黄葆芳、方增先都是他的弟子。吴昌硕的画“郁勃奇崛”,王个簃的画“烂漫浓华”,八十五岁后浑厚老辣、笔墨纵横、凸显个性。他全方位继承了吴昌硕的艺术传统并形成自己的面目,又有突破和创新,题材有很大扩展,书法进入化境。如《美术》杂志执行主编尚辉评论,“王个簃先生的艺术成就就是以金石笔法入书画,以花鸟画法画山水,以诗文修炼养浩气,以生活观察开新意”,体现出“我们这个时代一种激越、一种抒情、一种高昂的审美品格”。确实,“如果没有王个簃先生,海派艺术的影响不会有今天这么深远”。

三、海派艺术与第三代传人曹用平

曹用平先生八岁临帖,十七岁拜王个簃为师,每周求教一次风雨无阻,追随王个簃64年,可谓缶翁再传弟子中的佼佼者、“吴门嫡传”、“吴派推手”。如程十发题词“三世气不泄”,三代相传、精神不变。一个流派的形成和发展需要几代人的艰辛努力,曹用平先生的毕生努力,为吴派艺术的传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翻开《曹用平艺术人生集》,艺术家对待艺术与人生的态度皆令人感动,程十发先生的评论十分中肯:“用平画师孜孜于画桌上,而待人接物平易中具质朴淳风,对艺术不图功利,真正达到从肺腑中出。”纵观曹先生的一生,我觉得他有两个可贵的精神:

第一,尊师重教、衣钵真传。吴昌硕“三十学诗,五十学画”,以金石书法入画;王个簃从印入手,诗、书、画并举;曹先生秉承师训,诗书画印齐修,厚积薄发、闷中肆外。这是传统文人画的正道。曹先生重师恩,“文革”中曾代老师写“检查”,让女儿望风。后来曹先生又废寝忘食地帮助师长整理文稿,出版诗集和“随想录”,抢救了弥足珍贵的研究史料。老师对学生也是情同手足、形如父子,从王个簃劝戒烟、给曹用平病中长信可见一斑。早在1957年曹先生的作品即在全国青年美展获奖,80年代后又在上海、南京、南通等国内城市以及美国、日本、比利时、荷兰几个国家频频举办个展或联展,扩大了吴派艺术的社会影响力。

第二,敦品力学、做人第一。王个簃曾在吴昌硕先生诞辰140周年时撰文,题为“敦品力学,继往开来”,指出吴昌硕之所以成就非凡,来自于敦品力学,特别是敦品。还时时勉励曹先生“勤修苦练”、“奋心前闯、全力进修”。曹先生始终谦虚谨慎、困知勉行、刻苦研习。他是一位非常重情重义的人,对母亲和其他亲人乃至家乡父老都时怀感恩之情。他与夫人相敬如宾,取画斋名“革非楼”,以念夫人相濡以沫之情,同时也存艺术革新之意。每逢王个簃先生的诞辰日、逝世日以及个簃馆的5年、10年、20年庆典,曹先生总能从上海邀来一大批名师大家,既出于对老师的感恩与怀念之情,又可从旁看出曹先生为人亲切,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所以程十发说“曹用平为人为艺都是第一流”不是凭空而来。

曹先生为家乡做了许多好事、善事,1987年为建个簃艺术馆热心奔波、联络(我曾分管个簃馆),1992年为让赵丹魂归故里,建丹亭树雕像一事也是由曹先生促成,当时我也曾参与讨论和建设工作。曹先生还曾参与安排接待通州籍四甲坝人姜体臣老先生回乡,并联络捐资兴建“南通体臣卫校”。他精心辅导、提携吴派第四代传人施作雄等,使吴派艺术在南通生根发芽,又先后为个簃馆10周年捐画50幅,奖金5万;向通州捐画120幅,奖金10万元;多次为抗癌、慈善活动捐画捐款;此次又向市博物院捐画40幅。从曹先生自撰联语:“真诚一生嫌善少,平安两字至乐多”中,即可体会到他的坦荡襟怀。

独树一帜：南通文博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回顾与思考

王倚海

南通是滚滚长江和滔滔黄海共同造就的城市,成陆历史不长,建城历史仅千余年,但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青墩遗址,南通的远古文明则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一脉相承。南通的文博资源不算丰富,在江淮文化与吴越文化的激荡下,在漫长的渔猎与煮海的征程中,南通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江海文明。1905年,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先生借鉴西方博物馆理念,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即在南通起航。

南通全市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12处。其中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通博物苑、水绘园、青墩遗址等6处,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广教寺、濠阳小筑等24处,南通市文物保护单位文庙、文峰塔等50处,各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三门闸水利工程等132处。全市有博物馆近30座,其中市区23家,收藏文物6万多件。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板鹁风筝制作技艺等6个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吕四渔民号子等11个项目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海安花鼓等39个项目被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吴元新、郭承毅等4人被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一、先知践行——于无声处听惊雷

博物馆是西方近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它被视为反封建、反愚昧的一种进步的、有力的文化形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不少中国人通过不同的途径把博物馆介绍到中国。1895年,维新派建立的强学会提出“四项要务”,其中就包括建设博物馆。梁启超在《论学

会》中写到,“欲振中国,须兴学会”,而学会会有16件大事要办,其第12项就是“开博物院”。

尽管偏居江海一隅,但实业有成的张謇始终关注着社会的剧烈变迁,并竭力主张开办新式学校和博物馆,以启迪民智。特别是1903年的日本之行,给张謇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那年,日本第五次内国劝业博览会在大阪举办。应邀与会的张謇同时对其教育和实业进行考察,他发现,日本很多的职业技术学校,或是高等学校,都附设有自己的植物园或博物馆。张謇眼界大开,不禁发出感慨:“救亡图存,舍教育无由。”

归国后,张謇分别投书清政府新成立的学部 and 倡议新学的张之洞,建议在京师设立帝室博览馆,并“渐推行于各行省”。在遭到清廷的冷遇之后,他索性躬行实践,把在家乡规划建设中的植物园一举改为博物苑。

1906年1月3日,张謇在日记中提到“规划博物苑”,这是有关南通博物苑的最早文字记录。事实上,博物苑的创建不能简单地从这一天开始计时,因为在数月前,张謇已“筑苑垣,建苑表门”,只不过那时不流行奠基等仪式,未留下更确切的记录而已。

张謇执意创办博物馆,与他“教育救国”的理念密切相关,他认为,博物馆具有利用实物来培养人才的作用。因此,教育功能在博物苑的建设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例如在为苑内藏品分类时,张謇特意改变原定分成天产(自然)、历史和美术的设置方案,另行增加教育部类,由此可见其对教育的重视。

除去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精到论述外,张謇在其他方面也多有深入的思考和阐述。如今,人

们公认他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开创者,不仅是指他缔造了一座具体的南通博物苑,而且包括他对中国博物馆学的理论构建。这些论述直到今天仍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通过对早期博物苑的回顾,我们就能在许多方面印证张謇的博物馆理念。张謇在上书张之洞时曾提出,博物馆应当“便于交通”,并且展馆之间“间设广厅,以备入观者憩息”,防止出现“博物馆疲劳”。在建设时,张謇果然把博物苑设立在风景优美的濠河之滨,并且广植花木,安排有假山以及亭台楼阁等园林设施,形成一个既是博物馆又兼具动植物园及传统园林性质的组合。现代博物馆与古典园林相结合,室内陈列与室外活体展示并举,应是张謇的一个创举,他使中国博物馆事业在开创伊始就显示出自己的特色。

张謇深知文物是博物馆的基础,于是毫不犹豫地率先捐出自己所藏,而后于1908年刊印启事,广泛征集藏品。1910年,南洋劝业会在南京举办时,张謇利用大会审查长的身份,大量购置展品,从而大大丰富了博物苑的收藏。到1914年,博物苑已初具规模。

南通博物苑的早期主要任务是配合学校教育,同时也接待知识分子和中上层人士。在张謇的努力下,南通成为“模范县”,更使博物苑吸引了不少著名学者和国外友人前来参观。1920年,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在张謇陪同下参观博物苑,同年由张謇、黄炎培发起的江苏省自治组织“苏社”在南通成立,与会会员和来宾120余人游览博物苑。1922年,中国科学社在南通召开第七次年会,马相伯、梁启超、竺可桢等学者名流畅游博物苑,盛极一时。

二、明珠蒙尘——万马齐喑究可哀

1922年秋季南通一带的连续暴雨,似乎是一个黑色的征兆,它不仅给田头待收的棉花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也为原本兴盛发达的南通罩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列强经济侵略加剧、国内政局动荡、纸币信用丧失酿就的金融风暴,将支撑张謇事业的大生企业集团拖入困境。尽管张謇以顽强的意志探求生路,但终因满目荆棘而举步维艰,博物苑在这种状况下的命运可想而知。

1926年,张謇与世长辞,博物苑的前景愈发

变得难以预料。张謇去世之后,张孝若继承了父业,他颇有才能,但毕竟受命于非时,在国内棉纺织业普遍危机的大势面前,任何人也难以回天。南通博物苑由于缺少资金支持,犹如一叶不系之舟。因为经费不足,加之苑丁裁之又裁,1932年11月,博物苑发生一起重大失窃案,南馆陈列的古玉器、瓷器、铜器等80余件文物被盗走,此事直接导致原苑主任和会计的辞职。为吸取教训,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在财力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张孝若拨出专款对南馆进行了大修。

1938年,日军侵占南通。在沦陷前,博物苑组织人力从南馆挑选文物50余件,从北馆选取书画、绣品43轴,悄悄移存农村,次年转存上海金城银行保管。但是,博物苑遭到日军的严重破坏,藏品大部分被劫或被毁坏,机构不复存在,房屋残破,园圃荒芜,室内设备及花木、鸟兽荡然无存。濠南别业被占用为“大日本军南通警备队本部”,苑舍沦为日军的马厩。最令南通人刻骨铭心的是,日军竟把一只丹顶鹤射杀,煮以下酒。据说另一只也因此绝食悲鸣而死。人们把丹顶鹤之死看做一种象征,反映者侵略者的暴行和不甘臣服者的愤怒抗争。

1945年抗战胜利,其时的博物苑已然满目苍凉。然而,博物苑的遭遇并未引起国民党当局和社会的重视,不仅没有及时修复,反而继续肆意破坏。所幸的是,保存在金城银行的文物大致完好,只是部分字画因藏运不当而受潮烂毁。

三、艰难复兴——铁马冰河入梦来

1949年2月2日,南通城解放。同年9月,在南通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范北强、顾贻予等8位中教界代表以“促进教育文化事业,保存有历史纪念性的文化艺术”为由,提出《恢复博物苑》的提案,要求“就原有博物苑房屋修理使用,调查并收回原博物苑的各种陈列品,号召人民献出家藏的文化艺术的书籍和物品”。

在人民代表的倡导下,文物征集整理委员会成立,准备南通博物苑修复工作。在那百废待兴的时期,南通人有着如此高度的见识,无疑是博物苑的幸事。会议之后,各界集资2.7亿元旧币,对各馆及园林道路进行整修,到1951年,修建工程基本结束。同时,博物苑改称南通博物馆,园林部

分辟为人民公园,这样原来统一的博物苑分拆成两个单位。

1956年5月,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在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历史并不太久,第一个公共博物馆,除了帝国主义者们在沿海地区所办的几个外,要算是张謇他们办的南通博物苑了”,这就为博物苑在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史上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但特定的时代免不了反复折腾,几经撤并没能给博物苑带来多大起色。尽管如此,博物馆在广大博物馆工作者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仍得以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中坚守阵地,有所作为。

十年动乱再次使博物苑陷入困境。博物馆的业务不仅全面停顿,而且露立在馆内的石人石马被造反派的铁锤毁坏殆尽。为了减少损失,工作人员想尽办法,如镶嵌在北馆后壁的张謇题“博物苑”三字砖刻,就是暗自用三合泥盖住而侥幸保存下来的。

1979年中秋,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的筹备会在南通召开,来自全国58家自然科学博物馆、各省博物馆自然部和部分新闻单位的68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一次在博物苑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大会,因为南通博物苑的重要地位得到来自全国的各博物馆专家的确认,大家一致倡议,齐心协力办好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

会议共开了五天,与会专家和代表的讲话和发言及题词中对博物苑给予较高的评价。中国科协副主席裴丽生说:在南通开会很有意义,会址选得好。他还说:各个馆要协助南通,把南通馆搞得更好些。著名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在参观南通博物苑时挥笔题词:“中国第一博物馆,是最有价值的珍宝。”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孙照寰留言说:“看到这个博物馆的实际情况之后,更使人感到为我国博物馆工作者和南通人民骄傲。”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吕济民处长(后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则对博物苑的保护和利用等问题提出要求:博物苑原有的建筑设施要保护好,以存其原貌;博物馆要同人民公园团结协作,相辅相成,共同保持原博物苑的特色。将来条件成熟,两单位可以合并,恢复为博物苑。与会代表还借机提出了利用南通优秀的纺织资源,建设纺织博物馆

的设想,引起良好的反响。

四、盛世抉择——千树万树梨花开

城市的灵魂在于文化,文化是城市的魅力所在。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新一轮的城市发展中,市委、市政府把“传承第一城精神,再造新世纪辉煌”作为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环濠河博物馆群的建设可谓为南通城立根铸魂的点睛之笔。

2001年,新世纪的第一年,市委、市政府果断决定进行濠南路改造。当年7月,工程竣工,一批昔日被违章建筑湮没、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建筑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尤其是尘封已久的南通博物苑重放异彩。同年岁末,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在其精心编撰的《江苏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中,对南通的旅游业作出历史性定位:博物馆之城——南通之旅。着眼于南通丰富的文博资源,专家为南通勾勒的“博物馆之城”,正与南通市委、市政府的想法不谋而合。

2002年1月19日,时任市长的罗一民在《南通日报》刊载的署名文章《遥望博物馆之城》一文中作出批示:“关于‘博物馆群’的建设问题,有关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论证,制订可操作的实施方案。”3个月之后,在征求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市发改委向市政府提交《开发建设“环濠河博物馆群”的初步实施方案》。

同年7月27日,应南通博物苑之邀,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规划建设新展馆。因越江不畅,吴先生较晚到通,未及入住,直接驱车连夜察看博物苑。第二天一早,他再次来到博物苑,仔细听取工作人员讲解,不时加以提问。参观博物苑后,他还深入西南营和寺街等历史街区考察,登上钟楼遥望长江。中午,市长罗一民在南通大饭店会见吴先生,吴先生则将心中的话题和盘托出:根据中西近代建筑规划史研究,张謇先生经营南通的起点为1895年,比西方建筑规划师霍华德规划的西方近代城市要早3年,南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

2003年1月13日,市委书记罗一民在京参会时,专程拜访吴先生,了解博物苑新馆设计情况。吴先生展示新馆设计草案时,饶有兴致地论及“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概念。他指出,经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获

得初步的诠释：“张謇经营之南通，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产物，它不同于租界、商埠或列强占领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是中国人基于中国理念，比较自觉地、有一定创造性地、通过较为全面的规划进行建设和经营的第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

3月15日，市委、市政府在清华大学召开“南通博物苑总平规划、新展馆设计方案论证会暨‘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座谈会，国内各大媒体纷纷予以报道。会上，吴良镛先生正式推出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张謇与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

同年3~5月，《南通日报》以《让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大放异彩》为总标题，连续推出连续多期专版，研究、论证、推介“中国近代第一城”。

2003年和2005年，在第十二届人大一次、三次会议上，王倚海等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精心打造“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议案》、《关于以“百年苑庆”为契机，推进我市文博事业再上新台阶的议案》被列为会议的一号议案和唯一的一个议案，推进了“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论证和中国博物第一馆的建设。

2005年7月16日，国家邮政局发行“南通博物苑”特种邮票1套2枚，票面图案为南通博物苑历史建筑南馆和北馆。当天，由国家邮政局主办，江苏省邮政局和南通市政府承办的南通博物苑邮票首发式在南通博物苑举行。邮票是“国家名片”，地方题材登上国家邮票票面非常不易，一个地方博物馆荣登全国发行的特种邮票票面，在国内尚属首次。

2005年9月24日，“南通博物苑一百年暨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百年庆典活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江苏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江苏省文化厅、南通市人民政府、江苏省文物局、中国博物馆学会、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协办。南通博物苑一百年暨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百年纪念大会，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百年展览和“博物馆与城市发展”中外博物馆馆长高层论坛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为纪念大会发来贺信，向大会表示祝贺，希望南通博物苑继往开来，加快发展，再创佳绩。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克辉、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国际博协主席亚历山德拉库敏斯等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位文博界人士出席会议。通过南通博物苑一百年暨中国博物馆事

业发展百年庆典纪念大会，海内外更多的人了解到南通博物苑与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百年发展历程，了解到张謇先生对中国博物馆及其相关事业所作的重要贡献，了解到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推进了新时期博物馆事业崭新的发展历程。

2008年4月2日，中国首家国家审计博物馆——中国审计博物馆在南通开馆。该馆筹建得到中宣部，财政部，国家文物局，江苏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由中国审计学会、江苏省审计厅与我市共同建设。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全国政协常委、中宣部原副部长高俊良，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克志，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等领导出席开馆典礼。中国审计博物馆是迄今为止唯一以国家审计为主要内容的专题博物馆，也是世界上第一家国家审计博物馆。

2008年5月18日，国家文物局公布第一批83所国家一级博物馆，江苏省共有5家博物馆榜上有名，南通博物苑作为中国第一博物馆光荣入选。

在环濠河博物馆群中，南通博物苑是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目前，博物苑的藏品已达4万余件，通过出版苑史专著、创办苑刊、展陈出新、服务优质等一系列活动，博物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巩固、提升。尤其值得自豪的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百年庆典在南通举办，更对全市文博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除市政府投入兴建的张謇纪念馆、南通博物苑新展馆、中国南通珠算博物馆、梅欧阁纪念馆外，社会资金以多种形式投资举办了一批规模、影响较大的博物馆，如南通城市博物馆、中国体育博物馆南通馆、南通风筝博物馆、南通板鹁风筝艺术博物馆、南通长寿博物馆、南通中国上市公司实物股票收藏馆、蓝印花布艺术馆等，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文博事业的蓬勃发展。一个由政府为主导，多元投入的“环濠河博物馆群”基本形成。

如今的濠河两岸，文气沛然的博物馆群已初具形态：张謇故居——濠南别业南侧，新展馆拔地而起，与历史文化保护区交相辉映。北濠桥畔，珠算博物馆奏响算盘的玉润金声。濠东绿地边，蓝印花布艺术馆演绎着蓝白世界的魅力。目前，南

通已拥有近 30 家博物馆,市区每 4 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已接近发达国家人均博物馆数。博物馆群的人文风情和濠河的宜人风光相得益彰,共同张扬着“中国近代第一城”的个性与魅力。

五、跨越腾飞——为有源头活水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的文博场馆从孤悬苍穹、形单影只,到品种繁多、门类齐全、遍及全市。文物保护单位从简单处置、一般修缮,到合理规划、科学保护以至蔚成气候绝不是偶然的。

(一)历史传承,是文博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基础

近代博物馆诞生于欧洲,它是欧洲近代社会改造中的产物。任何国家引进这种文化形式以服务自己,都存在一个本土化的问题。只有与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国情相结合,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才能实现它特殊的文化价值。张謇办的南通博物苑与南通本土的近代化改造,与中国社会近代化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着天然的血肉关系。

张謇创建博物苑开风气之先,促进了其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地方优秀文化人才,促进了民众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在外敌入侵和内乱中,正是由于张謇所培养的一批地方名流、社会贤达的奔走呼号,所熏陶的学校师生、广大民众艰苦努力,博物苑才得以逐步恢复并发扬光大。

张謇办实业、兴教育,留下了一批优秀的文化设施,尽管历经风雨,有所凋零,但仍立于南通。如果南通博物苑和张謇所创办的企事业单位的建筑得不到保存,“中国近代第一城”和“中国第一博物馆”只能留在深深的记忆中,或许根本就没有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这一宝贵遗产的可能性,更遑论什么再创辉煌!

(二)制度建设,是文博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关键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是文物保护工作的根本法规,是文物工作统一认识的基本依据,是规范政府、社会团体和公民行为的法律准绳。从 1983 到 2005 年,市政府先后 4 次公布我市 50 个文物保护单位,颁布了《南通历史文化保护规划》、《南通市市区历史街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

暂行规定》,将文物保护纳入法制轨道。与此同时,全市投入数亿元,修复、修缮各类文物建筑,并依托社会力量新建了一批新的博物馆。

在妥善处理文物抢救、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关系时,积极探索保护前提下的利用,科学、合理地发挥文物对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在文保单位的抢救与保护方面我们也做了不少工作。1987 年以来,全市投入 3000 万元,修复、修缮各类文物建筑 30 多处。对使用名人故居、古建筑而难以一时迁出的单位和个人,我市要求其与文物管理部门签订使用合同,对其提出严格的文物保护要求。为有效保护我市丁古角明代住宅,经省政府同意,并报国家文物局批准,我市对 6 间民居进行了异地搬迁。

我市在 80 年代修建市区主干道青年路时,成功地避让了南通制药厂内近代优秀建筑物。1991 年的特大洪涝灾害引起狼山塌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白雅雨烈士墓局部受损,我市及时组织人力、物力修复了烈士墓。1992 年,我市筹集资金 30 多万元,维修了天宁寺大殿,1997 年,又筹集资金 50 多万元,维修了光孝塔,恢复了其宋代风貌。如皋博物馆(水绘园)、海安博物馆(韩国钧故居)、如皋文庙大成殿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也在省市有关方面的关心和支持下得到了保护性的维修。

(三)科学发展,是文博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保证

随着全市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全面进步,我市文博事业也进入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如何减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推进博物馆良性健康发展是较为急迫与现实的问题。科学的理论指导科学的实践。新时期的科学指南就是科学发展观,是我们事业发展的理论保障。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理念,对传统的博物馆学理论,运行与管理模式和建设方向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濠河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与开发工作就是科学发展的例证。

濠河是南通旧城的护城河,周围密布着南通博物苑、濠南别业、沈寿艺术馆、文峰塔等文物保护单位。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期,由于缺乏合理规划和整治,两岸不少污染较大的工厂和违章建筑相继建立,并有大量的生活垃圾倾倒其中,

导致河水污染、河床淤塞,文物保护单位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侵蚀和威胁。经过不断整治、开发、建设,濠河水不仅恢复了往日的清冽,而且周围景色更美。我市先后搬迁了有污染源的工厂和车间22个,拆除了违章建筑12万平方米,清淤28万立方米,修建桥闸、泵站5座,从根本上改善了濠河水质。

与此同时,我市辟建了电视塔、纺织博物馆、沈寿艺术馆、张謇纪念馆、濠东生态绿地、文峰公园等20多个新景点,并开辟濠河沿岸林荫道近20公里,濠河沿岸充满了文化气息。狼山周边环境整治情况也是如此。经过整理过的濠河、狼山人文景点与自然风光相映生辉,成为南通的城市“名片”。

(四)媒体推介,是文博事业发展繁荣的动力

长期以来,各级新闻媒体十分重视对文博事业的跟踪报道,博物馆人也经常借用媒体的力量传播知识。如,我市的老报纸《通海新报》就经常刊发博物苑的启事,解释天体气象、动植物异趣,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抗战时,《东南日报》刊发任哲维先生的文章《博物苑》:“蝗军离开后的‘博物苑’,建筑十有八九,被破坏不堪,瓦片狼藉”,揭发

侵略军的罪行,呼吁社会各界保护、建设博物苑。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论证与推介和博物苑百年苑庆的临近,我市新闻媒体长期跟踪报道。

2003年3月15日,“南通博物苑总平规划、新展馆设计方案论证会暨‘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座谈会在清华大学召开,国内各大媒体掀起了“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报道热潮。在3到5月间,《南通日报》以《让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大放异彩》为总标题的多期专版更使“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新闻宣传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南通电视台则主动约请博物苑,联合制作《藏品故事》专题纪实片,分集连续播出。中央电视台CCTV-10“探索发现”栏目推出《百年博物苑》专辑,专题介绍南通博物苑。新闻媒体在第一时间传递博物苑的信息,激起群众爱国爱家乡的情感。

回眸历史,我们无比自豪,因为是南通文博事业鸣响了近代文明的汽笛,构筑了一座感动中国的文化丰碑。展望未来,我们任重道远。在跨越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时代征程中,文博事业的巩固与发展,传承与创新只有付出不懈的努力,才能续写华章、再创辉煌。

论遗产的双重属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保护

赵明远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博物馆

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学科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heritage 又译为无形遗产)一词与“文物”、“古迹”等词汇相比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术语,它的正式出现才过了十余年。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世界文化及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规定的文化遗产概念中有文物、建筑群和遗址三大类遗产的分类,公约中所说的文化遗产仅是指物质遗产。199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9届大会通过了建立“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决议,正式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1998年《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条例》的公布和2001年首批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公布,在全世界产生了轰动效应,我国的昆曲艺术名列其中,这推动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文译名进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学术领域。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术语一经出现,便成为国际博物馆学界高度关注的新课题。2000年在德国慕尼黑召开的国际博协博物馆学委员会年会就将“博物馆与无形遗产”作为讨论主题;2002年在中国上海召开的国际博协亚太地区大会也将“博物馆与无形遗产”作为主题,并通过了以“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全球化”为主题的《上海宪章》;2004年在韩国汉城召开的国际博协代表大会仍将大会主题确定为“博物馆与无形遗产”,并将当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也定为“博物馆与无形遗产”。在国际博物馆界的大力倡导下,国内外众多的博物馆和文化、艺术方面的学者曾针对“博物馆与无形遗产”这一主题发表了大量的

论述。

以国际博协亚太地区上海会议为标志,中国的博物馆学界迅速与国际学界对接,率先开始了“非遗”保护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至2004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前后,《中国文物报》、《中国博物馆》等报刊杂志已发表了大量学术文章,课题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博物馆的地位、责任、作用以及方法。一批展示工艺、戏剧、民俗、民族特色等内容的传统类型博物馆及新型的生态博物馆,在“非遗”保护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产生了国际影响。中国博物馆界积极投身于这一新兴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体现了中国博物馆发展的高度自觉。

2007年8月24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全体大会通过了新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章程修订的博物馆最新定义是:“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①定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正式列入博物馆的功能中,更明确规定了博物馆担负着保护“非遗”的职责。

二、“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双重属性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年8月我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为第6个签约国。2005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继之,2005年底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从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外来词语正式进入中国官方语言,并进而成为当前中国文化语汇中最为流行的关键词之一。此后中国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了明确的政府部

门分工,物质遗产工作继续归属国家文物行政部门,非物质遗产工作则归属在国家文化行政部门新设立的“非遗”工作职能部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各种活动日益活跃相比,中国的博物馆却逐渐淡出了“非遗”保护的中心,这也许是因为其处于“非遗”保护行政体系之外,同时可能也是人们对博物馆“根本的共同点就在于它的实物性”这一共识使然。

然而,将文化遗产划分为“物质”与“非物质”绝非遗产本身就有这样的天然类别,一项具体的遗产,通常同时具有物质与非物质双重属性。科学认识这种双重属性,对于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以及保护主体的选择有着重要意义。

(一) 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属性

《世界遗产公约》中规定,凡提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项目,必须符合下列一项或几项标准方可获得批准:

1. 代表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
2. 能在一定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筑艺术、纪念物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方面的发展中,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
3. 能为一种现存的或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4. 可作为一种建筑或建筑群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示出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
5. 可作为传统的人类居住地或使用地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尤其在不可逆转之变化影响下变得容易毁损的地点;
6. 与某些具特殊普遍意义的事件或现行传统或思想或信仰或文学艺术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一般情况下,此条标准不能单独成立)。

“在以上鉴别标准中,很明显地纳入了对遗产的‘非物质’文化(或艺术)的评价标准。在‘独特的艺术成就’、‘创造性的天才杰作’、‘建筑艺术’、‘文明与文化传统的特殊见证’、‘与思想信仰或文化艺术有联系’等表述中,指的正是那些文物、遗址、建筑群所承载的‘非物质’文化的价值评估。”^②非物质形态的价值都寓于物质形态之中,成为物质遗产价值评判的重要标准,这就是物质遗产的非物质属性。

我们试以“鼎”这样一种常见的器物为例来说

明。“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③作为食器的鼎,进入青铜时代后成为最常见的表彰与记录功绩的礼器,更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包含了丰富的精神价值。鼎所承载的非物质文化属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制造相关的工艺、技术、规范等,二是与功能相关的礼仪、典章和权力象征等,后者则更有深刻内涵,“鼎”即因后者而成为“鼎”。类似鼎这样的青铜时代的器物,是—定社会历史的产物,它原本所承载的非物质文化信息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环境的逝去而逐渐消失——尽管我们可以通过考古发现和科学研究来追寻甚至部分还原那些逝去的信息。所以此类文化遗产的主要性质是物质性的,被归于物质遗产。

我们再以世界文化遗产故宫为例,“紫禁城是中国五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权力中心,它以园林景观和容纳了家具及工艺品的 9000 个房间的庞大建筑群,成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世界遗产组织的评价着眼于古代建筑杰作,宫殿建筑瑰宝和珍稀文物宝库的主体意义,然而故宫所蕴含信息和价值岂止如此。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24 位皇帝相继在此登基执政,前朝后寝,是其主要活动场所,是中国最高权力中心、政治和文化中心,国家政治运行和皇室生活的一幕幕活剧在此上演了近 500 年,其间包含着难以尽数的典章、礼仪、程式和禁忌,显示着帝王权威的神圣和神秘,统治着亿兆臣民的心灵。然而随着王朝的覆灭,那些非物质形态的皇权与宫廷礼制也随之消失,只有依附于这座宫廷建筑群的皇宫建筑营造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人们研究并保护。可以设想,故宫内曾经有过的任何一项皇家礼仪或者宫廷艺术,无论是皇帝临朝理政的程式,还是各种皇家典礼、舞乐等等,都可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如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公布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韩国“宗庙祭礼”、“雅乐——越南宫廷音乐”、“柬埔寨皇家舞剧”一样。然而故宫曾经拥有的大部分“非遗”都已经随着时间消失。

(二) “非遗”的物质属性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属性的理解,首先可以从其物质载体、生成物、介质来考察,例如,作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昆曲,它的

演出剧场、舞台、布景、道具、服装、伴奏乐器以及剧本曲谱,还有各类介质的音影记录、文献资料,这些物质载体皆构成了其物质属性。不仅如此,在一个特定的昆曲表演场所,角色在台上的表演与看客在台下的观赏,共同构成了一个表演与欣赏相互依存的空间。这一空间和其中的人及一切器物也共同构成了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其中的灵魂是角色的表演。失去了表演与鉴赏的空间,此项“非遗”就将变异。因此更应从“空间”来认识“非遗”的物质属性。

再以另一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古琴艺术为例。古琴艺术是中国历史上渊源久远的一种器乐形式,韵味含蓄、虚实相生,讲求弦外之音、空灵意境。古琴自古是文人自我陶冶的一种雅好,所谓君子乐不去身,君子和琴比德,唯君子能乐等说法,皆融审美追求和道德追求为一体。古琴很少在公众场合演奏,只是文人雅集的内容,古琴艺术所拥有的物理空间应是文人雅集的场所,只有在这样的空间里,才能体现其高雅的韵味。古琴艺术的物质性,不仅体现于古琴乐器本身,更应体现在文人雅集的特定空间。现在展示古琴艺术时,热衷于在广场、剧院这样的空间,而事实上其作为“非遗”特征的韵味在这样的空间里已损失大半。

(三) 双重属性和整体保护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构成了文化遗产的双重属性,如“鼎玉龟符”、“鼎食鸣钟”、“铸鼎象物”、“鼎鼐调和”等成语的描述,这些器物都反映着一项项风俗礼仪、典章制度。同样,“非遗”的“表现形式”离不开物质载体和空间,如昆曲、古琴的古乐器、古曲本等,都可以作为博物馆的典型藏品,古戏台、琴台等都可以成为文保单位。

一项物质遗产可以承载无限量的非物质文化信息,其所拥有的非物质信息成为评判其价值的重要内容;一项“非遗”有着不同质态的物质载体,又需要不同层次的存在空间,这些载体和空间又决定着它的存在和消亡。遗产的物质和非物质两种属性彼此依存、相互包含、虚实相生、合而为一、共同生长、共同构成了遗产的基本要素。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文化遗产划分为“物质”与“非物质”仅是由于理论研究和保护实践的

需要而产生的,绝非遗产本身就有这样的天然类别。一项文化遗产只是因其主体性质和表现形态更多地体现为物质和非物质属性,而被认定为物质或非物质遗产,并因此保护的重点和方式有所不同。但对于文化遗产研究,要强调综合的研究,如在研究文物时,除了研究其物质形态之外,大量的课题是在研究其功能、承载的传统民俗和礼仪、有关的信仰和知识等非物质文化内涵。而在研究“非遗”时,除了对研究如何保护其表现形式之外,还要重视其依存的特定空间的保护。同样,文化遗产的保护,强调的是整体性原则,在保护其主体属性时强调物质属性和非物质属性的双重保护、整体保护,这才是对待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

在认清了文化遗产的双重属性后,即使是以“实物性”为特征的博物馆,其保护“非遗”的责任也得到了明确。

三、遗产保护:博物馆的优势

(一) “非遗”保护需要“专业”

在目前的“非遗”保护体系中,各级艺术研究院、所和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构成了主力,了解它们各具优势的同时,有识之士也认识到其明显的局限性:“从以往的实践看,前者搜集、保护文艺资料是为内部的研究,其成果往往是面对学术界的研究著述,而不是将资料直观地展示给社会大众;后者虽是直接组织大众开展民间文艺活动,但又缺乏永久保存相关资料尤其是实物资料的功能,且易受社会潮流的影响放弃传统项目去追求新的文化时尚。”^④艺术研究院所和群艺馆、文化馆原有的机构职能中并没有遗产保护这一内容,它们对新赋予的遗产保护职能因其学科手段、专业技能、职业经验缺乏而显得力不从心。笔者接触的许多基层群众文化工作者,虽然兼任了“非遗”保护工作,但至今对“非遗”项目仍不能从文化遗产的角度去理解。缺乏科学和专业基础又被利益所驱动的“非遗”保护,其结果可想而知。专家们对此表现了极大的担忧:“例如据某国际机构统计,在被称为‘民间歌舞之乡’的中国边陲某地,近年来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与‘保护’下,如今用于展示其原生态文化风貌的‘传统节目’,至少已有近70%不再原汁原味。而在这70%中,至少已有近30%的节目纯属当代人创作出来的伪民俗、假遗